

我与民主也门主席阿里 纳赛尔的交往

时延春

1967年11月30日,南也门彻底摆脱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宣布独立,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1970年11月30日,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改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简称民主也门。1990年5月22日,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实现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在南也门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于世的22年半中,共有5位元首人物先后执政,阿里 纳赛尔便是其中的一位。

从1960年阿里 纳赛尔投身到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占领的斗争,到1986年初他因内部斗争失败外逃,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他一直是南也门有影响的人物。他从政治舞台上退出后,曾一度默默无闻,但终于不甘寂寞,多年后他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创建了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矢志将其研究成果留给后代,载入史册。

不论在南也门,还是在叙利亚,我与阿里 纳赛尔都曾有直接、深入的交往,对他有较深刻的了解。

阿里 纳赛尔全名为阿里 纳赛尔 穆罕默德,原名为阿里 纳赛尔 哈萨尼,1939年12月31日出生在南也门阿比洋省达西纳地区的穆迪耶一个农民家里。他在达西纳地区读完小学和初中后,因家贫,于1958年到亚丁师范学校培训班学习。1959年毕业后,回到故乡,在达西纳小学任教,后任该校校长。

阿里 纳赛尔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1960年,他参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动,从事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被英国殖民当局视为危险人物,多次被捕入狱。

1963年,南也门民族阵线成立,阿里 纳赛尔即加入该阵线,参加阵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投身反对英国占领的武装斗争。他曾出席该阵线第一、二、三次代表大会。

1964年,阿里 纳赛尔担任南也门中部战线军事负责人和民族阵线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领导阿比洋省穆卡拉斯、达西纳、络岱尔一带的军

事斗争。1965年,他受民族阵线派遣,在开罗参加过两期军事训练班,一期为闪电突击队学校训练班,另一期为工程兵训练班。从开罗返也后,他被任命为民族阵线军事局委员,担任东部地区即夏卜瓦地区的军事负责人。

1967年11月30日南也门独立后,阿里 纳赛尔先被任命为岛屿省省长,后任拉赫杰省省长。

1968年3月初,在民族阵线第四次大会上,阿里 纳赛尔当选为总指挥部成员。3月20日,南也门首任总统对民族阵线内反对派采取清洗措施时,阿里 纳赛尔未被立即免职,继续担任省长。时隔不久,清洗名单中就出现阿里 纳赛尔的名字。同年4-5月间,他被免除省长职务。1969年4月6日,沙比总统进行内阁改组时,阿里 纳赛尔首次入阁担任地方行政部长。

1969年6月22日,阿里 纳赛尔参与伊斯梅尔和鲁巴伊领导的推翻沙比总统的“六·二二”纠偏运动。6月23日,南也门内阁改组,阿里 纳赛尔被任命为地方行政部长兼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长。同年12月29日,改任国防部长。1970年7月,他当选为民族阵线执行委员会委员。

1971年8月4日,阿里 纳赛尔任总统委员会委员、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成为南也门拥有实权的决策人物之一。1972年3月2-6日,民族阵线第五次大会在亚丁召开,阿里 纳赛尔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977年7月,我到中国驻民主也门使馆工作时,当时的阿里 纳赛尔作为政府总理,不仅要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还承担着繁重的外事工作。记得,1977年8月15日,他致电邓小平,祝贺他恢复职务。同年8月25日,邓小平复电感谢。

那一时期,南也门由伊斯梅尔和鲁巴伊联合执政。伊斯梅尔任执政的民族阵线总书记,鲁巴伊任总统委员会主席、民族阵线副书记。伊斯梅尔持明显的亲苏立场,鲁巴伊主张采取积极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强调对外关系要有自己的特色和独

立性,主张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在中苏严重对立的国际环境中,尽管伊斯梅尔在发展对华关系上采取消极立场,但由于鲁巴伊的推动和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中国与民主也门间的关系发展较快,中国向民主也门提供了大量援助,对其经济和两国关系的发展都起到重大作用。

我到馆后,担任使馆阿拉伯语主要译员,不仅要负责大使、参赞的口译,而且我国访问民主也门的许多代表团的重要会谈和会见也由我承担翻译。当时我国援也的经济项目多,阿里·纳赛尔经常接见中国大使谈项目问题,凡带有实质性合作任务的我国访也代表团,他都接见。这样,我就有很多机会见到阿里·纳赛尔。

阿里·纳赛尔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魁伟,说话坦率,做事干练。他比我大两岁多,每次会见时都显得非常亲切,常叫我翻译同志或翻译兄弟。一次,他对我说:“你现在在我们国家工作,再说我比你大,是你的大哥,你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就来找我把,我会帮你,不必客气。”

1978年4月下旬,阿里·纳赛尔率团访华,我参加了使馆为他访华进行的准备、联络工作,不止一次地见到他。他对此次访华给予高度重视。访问期间,他会见了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参观访问,获得了一笔新贷款。在中国政府为他访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中国与南也门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中国向南也门提供的援助与支持。他说,中国的援助对帮助民主也门克服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中国政府的援助和中国专家的劳动,在年轻的民主也门共和国几个省里建立了现代化的公路网。在卫生服务方面,中国人民为民主也门共和国做出了积极贡献,赢得民主也门的赞扬和尊敬。他相信,民主也门和中国之间的战斗关系和牢固友谊将会继续得到发展。他对这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对在华期间受到的热情接待深表谢意。

在伊斯梅尔与鲁巴伊两派斗争中,阿里·纳赛尔曾有意采取超脱不介入立场,成为两派争夺的重点人物,从而也增加了他在南也门政治舞台上的份量。但由于伊斯梅尔派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又控制着执政的民族阵线,双方力量对比的天平向伊斯梅尔派倾斜。这时,阿里·纳赛尔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决定站在伊斯梅尔一边。

1978年6月22日,阿里·纳赛尔参与了粉碎鲁巴伊的政变。政变成功后,取代鲁巴伊,出任总统委员会主席兼总理。同年10月14日,在也门社会党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0月29日,他被授予准将军衔,这是南也门最高军衔。在苏联的支持下,独揽党政大权的伊斯梅尔的权力欲越来越膨胀。12月27日,伊斯梅尔决定将总统委员会主席改为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即国家元首,由他任主席与也门社会党总书记,阿里·纳赛尔改任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兼总理。

伊斯梅尔执政后,对内大权独揽,对外依靠苏联,对中国采取不友好态度,甚至反华立场。在伊斯梅尔授意下,阿里·纳赛尔在大力吹捧苏联的同时,也有过反华言论。1979年4月13日他访问保加利亚时,在讲话中曾攻击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的正义立场,这是南也门领导人首次公开点名反华。对此,我们曾与南也门方面进行过交涉。

伊斯梅尔执行的内外政策引起也门社会党和人民群众的广泛不满,他与阿里·纳赛尔也产生了政见分歧和权势之争。1980年4月20日,阿里·纳赛尔联合国防部长安塔尔和政治局委员穆提厄向伊斯梅尔发动逼宫,让伊斯梅尔体面下台。伊斯梅尔见大势已去,遂交出大权,前往苏联长期休养。阿里·纳赛尔接任也门社会党总书记、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并兼任总理,成为南也门最高决策人。

阿里·纳赛尔在执政过程中逐渐感到南也门对外政策的局限性,便着手调整对外政策,突出温和、务实及多方位色彩,逐步改善对华关系。他执政后,多次表示愿与中国发展关系,并指令报刊停止反华。接着,两国恢复往来。1981年4月29日致5月5日,中国建材部副部长杨拯民率考察组访问南也门。1982年4月,也门社会党中央委员、中央副书记法德勒访华。5月18日,南也门建设部长阿塔斯率南也门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决定成立经济、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10月,南也门中国友协秘书长曼苏尔率代表团访华。1983年2月4~8日,中国外交部顾问何英率代表团访问南也门。4月6~15日,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刘庚寅率代表团访问南也门。7月,也门社会党中央书记叶海亚率南也门党政代表团访华,也门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正式关系。1984年5月29日致6月5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克尤木·巴乌东率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南也门。6月20~27日,交通部副部长王展意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南也门,参加由我国援建的阿比洋省津吉巴尔大桥落成通车典礼,南也门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一典礼,并高度赞扬中国的无私援助和中国为南也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贡献,称这座大桥为两国友谊之桥。9月13~16日,中国体委副主任陈先访问南也门。10月1日,南也门建设部长阿塔斯访朝途中在北京停留,参加了中国国庆35周年阅兵式观礼。1985年3月5~7日,中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黄杏文访问亚丁。同年3月7~12日,中国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刘实率工会代表团访问南也门。3月9~15日,南也门外长达利访华。5月10~23日,南也门青年联合会外事书记巴阿达姆率青年代表团访华。7月,南也门建设部副部长沙姆兰访华。7月29日~8月15日,也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白舒里率友协代表团访华。10月,南也门商业供应部副部长杰夫里访华。11月16~20日,也门社会党政治局委员萨利姆访华。1986年1月拟议中的阿塔斯总理访华计划因亚丁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而中辍。

从阿里·纳赛尔执政以来南也门对华关系演变的事实来看,他与伊斯梅尔时期执行的对华政策大有区别,从而促使两国关系由冷淡走向改善和发展。综观阿里·纳赛尔从参政到外逃整个历史过程,人们不难看出,在这13年中,他的对华态度走了一条U字型道路。他对华态度的这种变化,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在我看来,他在伊斯梅尔执政时期的对华态度冷漠甚至有反华言论,客观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因为当时伊斯梅尔在南也门主宰一切,阿里·纳赛尔处于受支配地位,还有与中苏尖锐对立的因素。但这段时间相对短暂。他握有决策权后,对华态度转为友好。同时,对苏联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他对苏联干涉南也门内政的行为深感不满,表示“要苏联人作朋友,不要他们做主子”。这些事实既反映了阿里·纳赛尔在对外政策中实用主义的一面,也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和政策走向。

1981年4月,我离亚丁回国工作,一直关注着民主也门的事态发展。1986年1月,亚丁政权内部发生内讧,导致火并,阿里·纳赛尔被迫流亡北也门。当时我刚从中国驻埃及使馆转到中国驻约旦使

馆工作,我通过新闻媒体才了解到这一事件的基本情况。1995年3月,我出任中国驻亚丁总领事后,许多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朋友向我详述了这场惨案的内幕情况。

阿里·纳赛尔执政时期,其地位和权威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主要来自安塔爾。不论在南也门独立前还是独立后,阿里·纳赛尔与安塔爾一直是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1980年4月20日,他们联手逼伊斯梅尔下台,阿里·纳赛尔掌握最高权力,安塔爾为二号人物,两人联合执政。但在联合执政过程中,二人间出现矛盾,主要是权势之争,都想利用职权扩充自己的势力。这种权势之争又带有浓厚的部落色彩和地方主义。就南也门社会来说,独立前经历了约3000年以部落为主体的奴隶、酋长和苏丹王国社会的社会形态,部族意识根深蒂固。独立后,许多行政区就按原部族划分,形成一个个山头,历届领导人多以自己的家乡及其所属部族为依托,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为自己的部族谋利益。阿里·纳赛尔来自阿比洋省,多起用该省人士担任要职,该省受益也多。安塔爾来自拉赫杰省,该省是南也门武装斗争发源地,在斗争中产生的干部不少,对南也门革命贡献也较大,但许多人受到冷落。这种情况引起安塔爾的强烈不满。

阿里·纳赛尔逐渐觉察到安塔爾的不轨言行,遂动用手中的权力,免去安塔爾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长之职,仅为其保留了最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职。这一措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加剧了两人间的矛盾。安塔爾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尤其重点依靠陆军重武器部队和他在部队中的老部下及拉赫杰地方武装向纳赛尔挑战。1984年初,安塔爾派人在也门社会党八中全会上指责阿里·纳赛尔权力过于集中,致使党内生活不正常。他联合几名政治局委员,一再要求伊斯梅尔回国。1985年3月,阿里·纳赛尔迫于国内压力,同意伊斯梅尔回亚丁。伊斯梅尔成为安塔爾的智囊,两人一文一武,联手向阿里·纳赛尔发难,不仅在组织上加紧串联,而且提出了政治纲领。阿里·纳赛尔日趋被动,其领袖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暗中作防范准备,1985年5月在亚丁一些单位发放枪支弹药,组建起一支在紧急情况下可随时动用的外围武装集团。1985年10月,在南也门社会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双方为争夺席位展开激烈斗争,两派都将自己

在外省的武装人员秘密调入亚丁近郊,形势一触即发。阿里·纳赛尔从大局出发,再次被迫做出让步,避免了一场兵燹。此后,双方在表面上维持了短时间的和平共处,但暗中都在作最后摊牌准备。在此期间,阿里·纳赛尔使出全部招数,力图吃掉对方或化解矛盾,但均未得逞。

1986年初,两派矛盾激化。1月8日,阿里·纳赛尔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人事安排问题。会上,安塔尔、伊斯梅尔提出早已准备好的方案,企图把阿里·纳赛尔的几个亲信从书记处、外长等关键位置上赶走,由他们的人取代,实际上是架空阿里·纳赛尔,尔后逼其下台。这一提议遭到阿里·纳赛尔的反驳,双方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争执不下,决定暂时休会,1月13日继续开会。阿里·纳赛尔于会前得知,安塔尔、伊斯梅尔已拟就逼宫方案,主要步骤是:在会上先向阿里·纳赛尔发难,逼其就范,不从,就对阿里·纳赛尔等人采取肉体消灭。阿里·纳赛尔获知情报后,即通知他那一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去参加会议,并确定了他们另外集合的地点。同时,阿里·纳赛尔先发制人,派出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于会前到达党中央所在地,将安塔尔、伊斯梅尔等4名反对派政治局委员打死。

1986年1月3日上午10时许,亲安塔尔、伊斯梅尔等人的警卫人员首先在也门社会党中央所在地发起攻击,拉开了两派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序幕。是日中午时分,战火蔓延到亚丁全市。安塔尔派的政治局委员比德逃出党中央所在地后,组织力量进行反扑。下午,亚丁电台播放阿里·纳赛尔炮制的也门社会党政治局声明称,安塔尔等4名政治局委员企图通过发动政变暗杀阿里·纳赛尔,政治局决定处决他们4人,并已执行。此项声明不仅无助于阿里·纳赛尔控制局势,反而燃起安塔尔等人的家乡拉赫杰部族的复仇怒火。接着,拉赫杰电台指责阿里·纳赛尔实行独裁专政,企图从肉体上消灭几名有影响的领导人,发出讨伐阿里·纳赛尔的呼吁,此呼吁得到比德所在家乡的支持。哈达拉毛省和马哈拉省党委均发表声明,公开反对阿里·纳赛尔。在这种情况下,南也门各地都形成两派,展开了混战。这场混战的特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群龙无首,自成体系,各自为战,完全失控。全国各地的陆、海、空各兵种、正规部队、公安部

队和地方民兵都纷纷卷入这场混战。交战双方动用了军舰、战斗机、装甲车、坦克、喀秋莎、115口径大炮以及空对地、地对地导弹等重型武器。

阿里·纳赛尔派在战局开始阶段处于主动地位,但随着内战全面展开,其处境逐渐变为被动。冲突发生不久,阿里·纳赛尔手下干将空军司令被打死,海军潜艇逃到埃塞俄比亚海域附近。亚丁战场失去统一的有力指挥,腹背受敌,士气低落,处于被分割挨打状况。阿里·纳赛尔重点依赖的阿比洋省缺乏重武器装备,该省通往亚丁的道路遭阻击,无法及时援救亚丁。而比德领导的反对派却组织起了大规模反攻。在军事上,他重点依靠武装部队前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两位副总参谋长和装甲、坦克、炮兵司令指挥战斗。在战术上,采取围点打援、外线作战打法,占据小亚丁及谢赫·欧斯曼等有利地位,与拉赫杰省连成一片,进退自如,增兵与后勤均有保证,其优势地位日益明显。

当时,苏联从其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希望南也门保持稳定,不要出大乱子。此外,南也门两派斗争以内部权势之争为主,并不危及苏联在南也门的根本利益,因此,苏联事先未插手冲突。事发之初,苏联明确支持阿里·纳赛尔,发表声明支持他粉碎安塔尔等人的政变阴谋;并称安塔尔等人为反革命。在南也门混战局势发生变化后,苏联开始进行斡旋。1月16日,冲突双方在苏联驻亚丁大使馆进行停火谈判,但未达成协议,冲突又起。

在这场长达12天的激战中,双方死伤惨重,损失巨大。最后,反对派控制了首都亚丁和全国大部分地区,阿里·纳赛尔败北,于1月26日率党政要员70多人和5000名左右武装人员逃往北也门。1月24日,也门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解除阿里·纳赛尔的一切党政职务。

阿里·纳赛尔逃到萨那后,受到萨利赫总统的庇护。但随着南北也门在统一谈判中取得进展,也门社会党部分领导人把阿里·纳赛尔必须离境作为双方实现统一的先决条件之一。阿里·纳赛尔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微妙尴尬,遂被迫含恨赴叙利亚,受到阿萨德总统厚爱。他在大马士革又建立了新家庭,与叙利亚一女工程师结婚,并生有一女。

阿里·纳赛尔在叙定居后,潜心撰写回忆录。在写作过程中,他深深感到,包括他在内的南也门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屡屡失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是，他们在决策时缺乏准确的依据，对情况的了解若明若暗，难以做出正确判断。与此同时，他认为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普遍存在同样情况，对战略问题都缺乏研究，也不够重视。这就激发了他创建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的念头。于是，他在1995年4月创建了该中心，总部设在大马士革，由他出任该中心主任。

阿里·纳赛尔在逃离亚丁十年零十个月之后，于1996年11月28日回亚丁探望故友。也门南北方大规模内战结束后，萨利赫总统早在1994年夏曾邀请阿里·纳赛尔回国参政，并许以高官厚禄，被他谢绝。这次萨利赫再次邀请他回也门探访故旧，他终于欣然同意，由萨利赫派专机接他回亚丁。阿里·纳赛尔到达亚丁时，正值萨利赫在亚丁办公，二人频繁会晤，共同出席社交活动。当时，我任中国驻亚丁总领事，在参加11月30日独立节纪念活动时见到他。我们都为这次意外相逢感到高兴，紧紧握手拥抱，互致问候。后来，阿里·纳赛尔又到萨那活动了一些时日，才返回大马士革。他想用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及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也门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留下一笔精神财富，作为永恒的纪念，这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大心愿。

1997年9月，我出任中国驻也门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后，曾在报上不止一次读到有关阿里·纳赛尔的消息。消息称，阿里·纳赛尔心脏病突发，十分严重，一度生命垂危。经医生抢救后，他恢复了知觉，但病情仍不稳定，身体极为虚弱。萨利赫总统闻讯后，先致电慰问，后决定动用总统基金，将阿里·纳赛尔送往英国伦敦住院治疗。阿里·纳赛尔到伦敦后，由著名心脏病专家为他动手术，并获成功。康复后，他重返大马士革，对萨利赫总统的关心及安排十分感激，多次打电话发电报表示感谢。

1999年11月，我转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2000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有，我见到阿里·纳赛尔。我们热情拥抱，亲切交谈。我们约好时间，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拜访他，谈得非常投机。我邀请他夫妇来使馆做客，他欣然接受，当即确定了时间。几天后，他与夫人及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出席了我与夫人的宴请。席间，我们频频举杯，亲切交谈，气氛热烈。他对我说，他已有20多年没喝过茅台酒了，还饶有兴趣地回忆起1978年4

月他作为民主也门总理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干杯的情景，言谈中流露出对中国的怀念。

2000年4月15日，阿里·纳赛尔夫妇邀请我和夫人到他官邸做客。晚8时，我们准时到达。他的官邸位于大马士革近郊新开发的高级住宅区，独家独院，主楼共4层，门口有警卫室，院内有车库、游泳池、草坪等设施，总面积约5000多平方米。室内摆设非常豪华，晚宴的饭菜极为丰盛，备有各种酒类。他们夫妇十分热情，他们的小女儿天真活泼，为这场家庭式晚宴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氛。

阿里·纳赛尔把我视为故交，谈了很多肺腑之言。他告诉我，1986年1月他下野后，一直住在萨那，为实现也门统一做了大量工作。但1990年5月也门统一时，他却成了无立足之地之人。当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邀请阿里·纳赛尔作为总统的私人客人到叙利亚定居。接着，阿里·纳赛尔向我解释了其中的奥秘。他说，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叶的一段时间里，他与阿萨德同为国防部长，相互接触频繁，志同道合，成为至交。当阿里·纳赛尔处于困境时，阿萨德便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援助之手。阿里·纳赛尔抵大马士革后，阿萨德给他提供了一切方便，其中包括无偿提供两栋楼房，大马士革城里的一栋用作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之用，近郊的一栋用作阿里·纳赛尔的官邸。

阿里·纳赛尔还告诉我，他主办的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得到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尤其得到阿盟和阿联酋总统扎耶德的支持与关照。该中心在开罗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由阿盟秘书长主持；第二届在阿联酋举办，阿联酋总统扎耶德和也门总统萨利赫等出席了那届研讨会的开幕式。扎耶德总统还专为阿里·纳赛尔提供了一座高级别墅和一处庄园。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第四届研讨会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举行，阿里·纳赛尔特意邀请我作为嘉宾出席，并向我介绍了许多阿拉伯世界知名人士。2000年6月10日，阿萨德总统逝世，阿里·纳赛尔极为悲痛。7月20日是阿萨德40日祭，叙利亚政府在阿萨德故乡卡尔达哈举行有4000人参加的追悼会。我作为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应邀出席，阿里·纳赛尔作为阿萨德的生前挚友在追悼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我们在追悼会上见面，他要我在卡尔达哈附近的拉塔基亚市住一夜，请我吃晚饭。

拉塔基亚坐落在地中海滨，阿里·纳赛尔请我尝海鲜。我们坐在海边，耳听大海的涛声，边尝美味佳肴，边交谈。他对我说，也门总统萨利赫一再要求他回也门，提出让他出任副总统兼总理，他一直在权衡利弊，未曾表态。他说，他是也门人民的儿子，根在也门，很想回去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事情。但他担心回国后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他认为也门需要进行彻底改革，他有这方面的雄心壮志，但也门的现实又不允许他这么办。他有过一次遭受重大挫折的教训，不愿意再重蹈覆辙。再说，他的身体状况和年龄也不允许他再去冒险。等他考虑成熟后，他将给萨利赫一个明确答复。过了一段时间，

他告诉我，他已经谢绝了萨利赫总统的邀请。

2000年9月28日，巴以冲突再度爆发，中东形势进入一轮紧张时期。阿拉伯国家成立了声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革命斗争委员会，阿里·纳赛尔出任主席。他显得十分忙碌，到处作报告、主持会议、征集募捐。我有时还能见到他，但见面机会比以前少了。2002年6月，我离任回国时，他正在开罗，忙于筹备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年会。他从开罗打电话给我说，他本想举办晚宴为我饯行，无奈赶不回大马士革，深表歉意。当我举行告别招待会时，他专门送了一个既大又漂亮的花篮，表达了他的一片情谊。